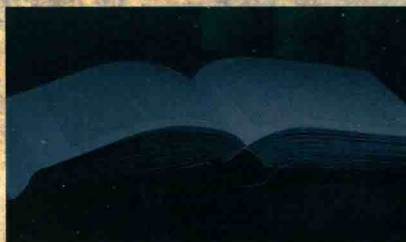




外教社  
博学文库

# 十九世纪中国 文化典籍英译史

A HISTO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赵长江 著

非  
外  
借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外教社  
博学文库

# 十九世纪中国 文化典籍英译史

A HISTO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19TH CENTURY

赵长江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赵长江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7-5446-4520-1

I. ①十… II. ①赵… III. ①古籍—英语—翻译—  
研究—中国—十九世纪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446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李健儿

---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302千字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100 册

---

书 号: ISBN 978-7-5446-4520-1 / H · 2076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博 学 文 库

## 编 委 会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姓 名	学 校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腊宝	苏州大学
王 蕃	北京师范大学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石 坚	四川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世生	清华大学
杨惠中	上海交通大学
何刚强	复旦大学
何兆熊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何莲珍	浙江大学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陈建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黄源深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程朝翔	北京大学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戴炜栋	上海外国语大学

# 出版说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服务外语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广学术成果、促进人才培养”的经营理念，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创新精神，多年来已推出各类学术图书 600 余种，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并为广大优秀的博士人才提供广阔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外教社博学文库”。本文库遴选国内的优秀博士论文，遵循严格的“专家推荐、匿名评审、好中选优”的筛选流程，内容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等各个领域。本文库为开放系列，理论创新性强、材料科学翔实、论述周密严谨、文字简洁流畅，其问世必将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在相关的外语学习和研究领域提供又一宝贵的学术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致 谢

在本书撰写与修改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与支持,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感谢恩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先生!先生学贯中西,视野开阔,不嫌弟子天资愚钝,谆谆教诲,把弟子领进学术大门。弟子每遇难题,总能从先生处讨来解题之钥;每每纠结,必找先生指路;每次听课,必有收获。与入学时相比,弟子已脱胎换骨,感悟已不可同日而语。点滴进步皆得益于先生的指点,再次感谢先生的教诲!恩师于百忙之中,拨冗撰写长文,几易其稿,为本书作序,今弟子感动无比。

感谢南开大学刘士聪教授、崔永禄教授、苗菊教授、胡翠娥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军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林克难教授,博士研究生期间的同学荣立宇、王治国、崔晓霞、张思永、江慧敏、李丙奎、张媛、王晓农、梁高燕、李建波、刘明、李玉平、郭晓丹、刘艳春、冯全功、王少爽和杨清珍,他们对本书的撰写提出过许多中肯的建议。

感谢西藏民族大学的领导及外语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全面支持。

# 典籍译史,彪炳千秋

——《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代序

我与赵长江交往有年,直到2010年他考入南开大学,成为我的博士生。在此之前,他是河北师范大学的外语教师,曾从事《红楼梦》翻译研究,写过一本有关《红楼梦》回目与人名英译研究的专著,当时我为之作序。不觉十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毕业,博士学位论文也要出版了,而且被纳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博学文库”系列。眼看着书稿就要发排了,序言还没到位,作者和出版社都很着急,笔者更是着急,因为太忙,虽然早有腹稿,但毕竟尚未落笔成文,承诺在先,若不能作数,岂不忐忑!

回顾我与赵长江的交往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段“改题”的历史。

一开始,长江中意的是《红楼梦》的翻译研究,这当然是不错的选题。在学界,中国之有“红学”,如同英国之有“莎学”(莎士比亚研究)——抓住这两头,国学西学就有了依托。号称中西兼通甚至中西融通而不懂“红学”和“莎学”的,只能是自欺欺人或自命不凡。况且,《红楼梦》诗词曲赋的翻译比较研究,既是我进入国学研究的第一站(此前很长时间曾沉浸在西学诸如心理学和哲学里),也是我于世纪之交进入南开大学参与举办“全国首届红楼梦翻译研讨会”的晋见礼。恰在最近,我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修订版面世的时候,赵长江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要出版了。这岂不又是一轮巧合!回忆进入博士项目以后,赵长江躊躇满志,一心想要在《红楼梦》翻译研究上大干一场;我却加以制止,认为他不宜再做《红楼梦》翻译研究,甚至认为不适合再做《红楼梦》翻译研究。因为第一,《红楼梦》翻译研究虽然在当时方兴未艾,但毕竟已经有了不少选题,盲目在选题上跟风,容易与别人撞车(当然,后来南开大学

博士冯全功重做《红楼梦》翻译研究,也十分成功);第二,长江素不喜理论,以注重实际见长,这甚至与他为人忠厚、性格直率有关,若继续做《红楼梦》而缺乏理论的导引和突破,我担心在博士层面上难以有大成,因此不再鼓励其继续做下去;第三,我观察长江的个性,发现他见多识广,记忆超常,谈起事情来有头有尾,头头是道,适合做历史研究,而且其文学的悟性是另一种素质。所以,建议他改做历史研究,而且当时他已经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领域颇感兴趣,因而自然地转向了典籍翻译史的研究。这样,不仅与国学不脱离,而且还需要考虑有更广泛的西学基础和国学出路。做了一番长谈,长江也同意,事情基本上就这么定下来了。

可是,经过几年学习,在进行开题报告的时候,又面临着一次“改题”。不过,这一次不是全盘改题,而是局部改动,也可以说是压缩和精炼。因为中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而且西译外传的历史也达数千年,即便从唐玄奘翻译《道德经》开始,也有不少年头了。在西方人的中国文化认识史上,从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笔下的东方世界的传说到后来欧洲哲人对中国道德理想国度的想象,中国的历史和形象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就中国典籍的对外翻译来看,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宗教、哲学类典籍一直是翻译的重点,仅自明末清初到今天为止,各代学人一直在不停地翻译,涉及众多语种,译本不计其数。以英译《论语》为例,至今已有六十多个译本;道家经典《道德经》的译本,早已成百上千,每过几天就会有新的译本产生。我的美国导师贝姆教授,虽然不懂中文,也从数种英文本整合译出其新本 *Dao De King*, 并且把“道”翻译为 *nature*(自然)。佛典的西译,除了《六祖坛经》之外,似乎多数直接译自梵文,甚至有译自日文的,从中文转译为英文的译作却较少。

面对如此浩瀚的资料和漫长的历史,倘若事无巨细,不加选择地做一个通史,难免流于浮泛,难以深入。对于初涉者而言,“通史”之定位并非好主意,而且堪称学位论文选题之大忌。赵长江的第一个开题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典籍西译史,从源头着笔,跨越数个世纪,依顺序而写,篇幅长达二十多章,这显然不可取。不过,如此这般准备一下的好处是,能督促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所用的文献,从而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扼要而全面的概貌图景。他由此认识到,通过恰当的翻译策略和



方法来表现中国的文化思想是翻译操作层面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不同的时代，由于翻译目的不同，策略与方法也会有较大的变化。

赵长江认为：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译作对中国文化有所“美化”，旨在吸引更多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往往把翻译与注释混杂在一起，而且注释的篇幅常常远大于译文，表现了传教士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过度阐释。其中的典型案例包括 1687 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等传教士用拉丁语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9 世纪是中国与西方相互认识的一个世纪，传教士和外交官忠实地翻译了中国的文化典籍，一般采用“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策略，貌似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但实际上只能是他们眼中文献上古老的中国。20 世纪上半期起，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进入现代社会，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也呈现出多样化景象。譬如，辜鸿铭采用“以西释中”的策略阐述中国文化思想，王际真和林语堂采用编译的形式来从事翻译实践，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开始出现了全译本，……，开创了中国人与外国人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新局面。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英美等国家，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中呈现出研究与翻译并重的趋势，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 1919—1991)、安乐哲(Roger T. Ames)、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纯粹以翻译为职业的译者极少。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内地学者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致力于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队伍日益壮大，但译作的品种和类型不多。例如，随着译学研究的深入和翻译难度的加大，六经之首《易经》日益引人关注，英国汉学家、《红楼梦》合译者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也从文学翻译转向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翻译，花了 12 年工夫将《易经》译为英语，2014 年底在企鹅出版集团维京出版社(Viking Penguin)出版；美国诗人兼翻译家梅丹理(Denis Mair)一面保持与当代中国诗人的接触，继续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一面把目光投向古老的《易经》，从事英译，已成初稿，目前在修改完善之中。关于《易经》译本，英文版也已有十几种，包括早期汉学家的翻译和中国当代译者的翻译。有关如上种种，我的弟子王晓农博士有专门的研究，基于其研究成果的相关著作不久前业已出版发行。

毫无疑问,几年攻读期间,长江看了不少书,也勤于思考,对于历史的学问很感兴趣,也开始关注理论问题,这诚然是不错的起点和刻苦学习的收获。我们几次谈话商讨之后,他确定做一个断代史的研究,选中“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我同意了。这个题目属于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史,事实上,虽然压缩了篇幅,只取中段,舍去两端,但要前瞻后顾,思路贯通而文笔不能懈怠,仍然有很高的要求,而且有一定的难度。首先,资料收集不易。一百多年前的译本,甚至更早的译本都要看到,虽说采用二手资料要方便得多,但有可能以讹传讹,不足为训;若能全部采用一手材料,则有可能发现和纠正以往学者使用和引用材料不准确和不适当的问题。其二,可借鉴的现成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中国对外翻译史的著作虽然不乏鸿篇巨制,但由于传统史学的影响,大部分是材料的堆积,鲜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其三,切入角度的选择不易。在原则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是传播中国的文化思想,进入西方后就会融入到西方文明之中,因此,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段翻译史,更能显示其价值所在,对于19世纪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总体地位和实际影响也能看得比较清楚。

从论文完成的情况来看,《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作者概略性地对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进行梳理与研究,从中理出了四条翻译线索,各有所获:其一,传教士英译中国的“四书”“五经”等思想类典籍。关于这一方面,长江的研究较为详尽,其中对于传教士的翻译目的和中国儒家经典的过度阐释问题,讲得颇有见地。以我之见,这种从基督教观点阐释儒家经典的做法,在具体的个别结论上难以有令人信服的结论,一些翻译措辞也不尽如人意,但有宗教的世界观高度,进行文化比较,易于发现中国文化的弱项,许多问题虽然尖锐,但发人深省,对于中西文化融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可一概而论。其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类典籍,其中的文学翻译是一种倾向;这种情况与他们的职业习惯只是部分相关,而文学翻译的个人趋向,是一种自由选择倾向,值得关注,但许多翻译还没有达到翻译文学的高度,需要给予认真的翻译评价和详细的专业评论。这样的视角,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期待。其三,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受到当时刊物

对内容的取舍以及连载形式的影响,后来收入集子出版和作为书籍出版与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在当时,是与走在世界前列的英国社会报刊的出现及其发行密切相关的,而且对于中国的刊物和传播媒介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其四,汉英词典中有关中国文化典籍的术语和句子的英译,严格来说,这一部分也可以不包含在典籍翻译之中;但是,词典编纂作为典籍翻译的基础和起点,在翻译的起源和历史上具有奠基的作用,不可忽视。此外,辞典编纂本身的语言学价值、词典学价值以及人类知识积累的价值,却远远大于典籍翻译本身的价值。这些方面,目前的研究极为缺乏,而且缺少文化战略眼光与专业求精精神,致使许多有价值的辞书束之高阁,蒙尘封闭。希望有关学者在这个领域能有新的认识和突破。

本书还对19世纪之前和之后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情况进行了介绍,使之首尾相接,勾勒出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大致面貌。此外,19世纪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译者都是外国人,而且大部分居住在中国进行翻译,故而提出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研究。我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开拓性意义,是长江翻译研究的一个亮点,在理论上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包括定义的严格化和分条的论列。书中指出:

明末清初以来,大批传教士入华,不少传教士在中国一待就是几十年,不少传教士客死在中国,为传教事业奋斗了终生,这是他们的信仰。除此之外,他们还写文章介绍中国,通过翻译把中国文化典籍送入西方,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一批在异国他乡土地上生活的文化使者。进入19世纪以后,除传教士继续来华外,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出现,外交官也来到中国,他们也长期在华生活、工作、翻译中国文化典籍,为所在国的对华政策提供决策信息。传教士、外交官等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中国,除正常的工作外,利用业余时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翻译中国文化典籍。这种现象可称为“侨居地翻译”。(见本书第223页)

以下综合赵长江博士的论述,就“侨居地翻译”加以简要梳理:

一、关于“侨居地翻译”的界定,主要有五点:其一,译者来自原住国,并接受了原住国的文化教育;其二,在侨居地进行翻译,也就是说,译

者要脱离原住国的文化语境,在侨居地文化氛围中从事翻译;其三,加入侨居国国籍后,其翻译不再属于侨居地翻译;其四,翻译对象主要是侨居地文化典籍,即顺译,也可把原住国文化典籍译为侨居地所用语言;其五,出版地在侨居地或原住地。据此来衡量 19 世纪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无疑属于“侨居地翻译”,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翻译地点在中国,即“侨居地”,出版地点主要在中国,也有部分译著在国外出版。马士曼的翻译也属于“侨居地翻译”,只是其翻译对象不属于侨居地文化典籍,但符合其他几条界定。

二、“侨居地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早已存在。东汉末年,佛经传入中国,佛经翻译随之开始。佛经翻译分为三个时期:(1) 外国人主译期;(2) 中外人共译期;(3) 本国人主译期(罗新璋,1984: 53)。在“外国人主译期”中,译者主要来自西域,有支谦、安世高、支娄迦讖、鸠摩罗什等,这些译者侨居在中国将佛经译为汉语,这种翻译现象属于“侨居地翻译”。在“中外人共译期”中,中外译者都参与了佛经翻译,属于本土翻译与侨居地翻译混杂的一种状态。在“本国人主译期”则属于本土翻译,不是侨居地翻译。“侨居地翻译”并非 19 世纪才有的现象,但在当时达到了高潮,其标志是:翻译主体由 17 世纪中叶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变为 19 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外交官和部分商人,翻译对象扩大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文化典籍都有了英语译本。19 世纪“侨居地翻译”是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与中国的近代化密切相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有关系。

三、进入 20 世纪后,仍有不少外国译者在华英译中国文化典籍,如邓罗(C. H. Brewitt-Taylor, 1857—1938)英译《三国演义》(*San Kuo, 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1925),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英译《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 1932)等。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侨居地翻译”现象依然存在,比如,沙博理(Sidney Shapiro, 1915—2014)英译《水浒传》《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等,还有戴乃迭(Gladys Yang, 1919—1999)、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1915—2005)等。但是,这一时期的侨居地翻译有些复杂,爱泼斯坦和沙博理分别于 1957 年和 1963 年加入了中国国籍,在他们加入中国籍之前

的翻译属于侨居地翻译,加入之后的翻译则变成了本土翻译。在“侨居地翻译”中还有一种混合状态,比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作翻译即属于此类。戴乃迭在中国翻译了多年,但她没有加入中国籍,属于侨居地翻译,而杨宪益则属于本土翻译,所以杨、戴二人的翻译属于本土翻译与侨居地翻译相结合的一种类型,明代久居中国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也属于此类翻译。在这种结合中,本土译者和侨居地译者谁在翻译中起主导作用需要进一步考察。

通过以上现象描述,可以对“侨居地翻译”进行一些基本的理论说明:

一、侨居地翻译是一种普遍现象。只要是外国人侨居在一个国土上,进行与这个国家有关的翻译活动(包括出版活动),都可以称为“侨居地翻译”;

二、侨居地翻译的方向可以是侨居地文化典籍的外译,也可以是侨居者本土文化典籍向侨居地语言的翻译,但以前者最为典型;

三、侨居地翻译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既与侨居者本人的本土文化状态相关,也与侨居地的开放程度相关,与两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也相关;

四、受以上条件影响,侨居者的身份会发生变化,从外国人(侨居者)转向本地人(本国人),或者返回原本土,侨居者的身份由此消失,其翻译活动亦不再属于侨居地翻译;

五、即使侨居者本人身份不变,侨居者和非侨居者也可以结成不同的合作关系,如家庭内合作关系、非家庭的合作关系等,由此构成复杂的混合的翻译类型、翻译思想和翻译效果;

六、一般说来,在侨居地的时间越长、活动范围越广、研究越深入,对所在国的文化容忍度越高,翻译的效果就越好,越容易为当人所接受,为当地读者所认同;

七、侨居者长期居住国外,对本土文化和语言有可能逐渐陌生,虽说其陌生程度无法与对侨居地文化和语言的熟悉程度成比例,但周期性地返回本土进行“充电”仍然是必要的;

八、侨居者亡故在侨居地,无论生前是否转换为本地人身份,都会为

本地人所纪念,作为国际友人获得荣誉,但也会为本国人所感到陌生或遗忘,这取决于其在侨居地的时间长短以及与本土文化联系的保持状态;

九、由于各种原因,侨居者也可能最终返回本土,其侨居者的身份消失,但其影响和作品(翻译成就)并不因此而消失,一般会继续在原侨居地或世界各地流传;

十、由于世界各国和各时期社会文化状况不同,侨居地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会有不同,因此,对侨居地翻译的认识和评价也会不同。

翻译活动的发生地,在翻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的《现代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中,甚至在此前该书的初版中,我已经提出了由翻译活动发生地判定“主文化”与“客文化”的区分。在我的新作《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中,我借助于类似的翻译地区概念,对同类现象做了相应的推广和发掘,希望能说明新的翻译类型,尤其是中国境内民族地区在组织翻译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的时候(如新疆地区在组织研究翻译民族史诗《江格尔》时的相对优势,与不同于汉族地区特别是京城学院派翻译民族典籍时在条件上的差别),其中包括可以借助的地缘和人缘优势、译本推广和评价上的不同特点,等等。

针对《江格尔》的翻译,我们想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生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在汉族地区甚至在国内外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翻译,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在首都北京(杨译)和英国(霍译)等的翻译,是不同的。因为在史诗的流传地区组织人力翻译这样的史诗,不仅参加者主要是少数民族专家和翻译家,而且也便于找到一种现场的田野工作的感觉,即便这种感觉可能是跨越时空的,包括物理的时空和文化的时空。至于这一观点的系统总结,本书将结合其他作品的翻译情况,在其他地方得到适当的扩展和发挥。(《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上卷,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1 页)

行文至此,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目前中国内地的学术研究中,即便

是传统的国学研究的领域，我们也特别关注西方的理论，以之作为研究的出发的和终结，但不大注意国内的相关研究的成果和进展，尤其不注意学理上的继承、发挥和研究资料的应用和解释；而在另一些领域，或者另一些问题上，却又特别拘泥于国学和国内已有观点的成见，包括对于西学、国学和翻译学的成见，难于有重大的观点的突破，难于与国际同类研究对接，归根结底，还是缺乏有分量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和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上的总结。希望“侨居地翻译”概念的提出和讨论，能有助于此类现状的改善。

最后，在长江的学位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我又建议将书名定为《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在此，我想借机说明一下历史叙述的问题。

众所周知，历史是一门叙述的学问，传统学术认为历史是记忆之学，这固然不错；但相比之下，记忆之后，如何叙述，则成为进一步的问题。要学会记述历史，讲叙历史故事，就成为历史学的要点，不可须臾离开了。就 19 世纪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而言，我以为，有几个问题，必须重申一下：

第一，在世界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讲述这一段断代史，当然要有世界文明史的“拉通”的学术背景作为基础和开端；否则，但就中国文化典籍如何翻译讲起，是无论如何也讲不清楚的。因此，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要把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按照编年顺序，作以宏观的梳理，以备后用；其中 19 世纪这一段历史处于人类中西文化交流的何种地位，以及中国文化处于与西方世界相对应的何种地位，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对于西方世界自身发展的意义也就一目了然了；而且，翻译的必要性、翻译目的和传播效果的评价，都不是毫无根据的了。

第二，在 19 世纪，把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加以梳理，进行编年，作为背景；然后，把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和翻译的事件，作为前景；将两者置于其中，互为对照，便立即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意义，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凸显。缺乏这种对照，就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地方，或者作者认为已经说清楚了，但实际上对于读者还是无法搞得清楚。19 世纪中国典籍对外翻译的过程本身，不是分类的而是编年的叙述，当然不是事无巨细的一览无余的叙述，而是摘取要者

加以提纲挈领地叙述,即可见出开端和结尾、过程和高潮以及总体的发展趋势。

第三,历史叙述本身,作为一种学术的语言,自然也要是纯净的文笔,付诸概括的叙述和流畅的行文。这样,读者才能读得下去,读得有心得,耐人寻味。扼要言之,历史笔法可以有宏观的叙述,抓住重大的事件和趋势,以如椽巨笔,付之于概要的叙述,使人得其要领,观其大略。微观的叙述,即细节的叙述,甚至是静态的叙述,使人得其细节的真实感,要有分析和文本,有语言细节、生活细节、社会场景细节,甚至有奇人异事的细节,供人欣赏和思考。缺乏这种细节,就没有历史的真实感了。居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叙述,是中观的,即半抽象半具象的描述或叙述,时而进入一个场景,时而从中摆脱出来,纵横交错,联袂成篇,涉笔成趣,让读者一起游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获得信息和思路,陶冶情趣和心性,才算得上是成功的历史叙述。在这一方面,乃至以上三个方面,长江的这本《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者自己也有同感,他感慨地说:“翻译史的写作很难,稍有不慎,便会落入搬材料的尴尬境地。”这是过来人之言,发自肺腑,可引以为鉴。

但我以为,长江这本《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的出版,正当其时,就其质量来说,虽未可谓名史,但与当下出版的相关博士学位论文相比,却毫不逊色,单就选题的前瞻性而言,则可谓占一步之先。无论如何,对于当下的典籍翻译研究,它的问世都会起到警示和推动的作用。当然,与此同时我也殷切期待,很快有后来者写出更有分量的断代史著作,继而写出有分量的通史著作,为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树碑立传,载誉千秋。

王宏印(朱墨)

2016年11月8日于北京



# 前 言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肇始于 2002 年，由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提出：“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战略，着力宣传当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大力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以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为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现代传播方式，树立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把我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党的十八大报告针对文化领域着重提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由此可见，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方针，学界无需畏手畏脚，作茧自缚，而应大胆践行，奋力开拓。

中华文化走出去离不开翻译，因为翻译是中外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座桥梁。为了配合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我们要摸清中华文化对外翻译的家底：有哪些中国文化典籍译成了外语，在什么情况下译成的，译介到了哪些国家，译本面貌如何，译者是谁，产生过何种影响，等等。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翻译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更是有较大的价值和意义。《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梳理了中国文化典籍在 19 世纪的英译情况，部分地澄清了上面提到的问题，以冀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做出些许贡献。

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始于明末清初，交流的主体是来华天主教传